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主体性培育

邹金真

同济大学 上海

【摘要】当前，城乡要素单向流动引发经济、人力与社会资本三重流失，不仅揭示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深层矛盾，还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为破解这一困境，本文构建“制度-文化-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现，包括制度层面的参与缺位、文化维度的认同弱化与能力维度的个体失能，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政府热、农民冷”的治理悖论。基于此，本文提出制度赋权、文化重塑和能力提升的三维协同路径，推动农民从“政策对象”向“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主体性；乡村治理

【收稿日期】2025 年 4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5 月 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177

Cultiva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inzhen Zou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At present, the unidirectional flow of resource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has led to a triple loss of economic,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his not only reveals the deep-rooted contradictions behind the absence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but also constrains the deep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ddress this dilemma,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vering “institution-culture-capacity” is constructed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absence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ncluding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weaken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incapac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 capability dimensi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dimensions has given rise to a governance paradox characterized by “active government and passive farmers.” On this basis, a coordinated path involving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is proposed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from passive policy recipients to active governance agents, thereby injecting sustainable endogenous momentum into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Safe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1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民主体性培育日益成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及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尽管政策文件中多次强调要调动农民主体性，然而现实中仍普遍存在“上动下不动”“干部干、农民看”的被动局面，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如何有效培育和激活农民主体性，已成为一个亟需理论回应与实践探索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农

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性的内涵特征。学者认为独立自主性、自觉选择性、主观能动性是农民主体性的内在特征^[1]。二是农民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与成因。研究揭示了当前农民主体性普遍面临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困境^[2]，而制度建设、个体能力、组织推动与文化涵育是导致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因素^[3]。三是农民主体性培育和提升路径。代表性观点包括：“赋权赋能说”主张通过政策、市场和社会赋权等手段增加农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4]；“文化整合说”认为文化实践是提升农民主体性的关键^[5]。此外，“技术赋能说”也逐渐受到关注，

作者简介：邹金真（1999-）女，仡佬族，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强调通过数字技术搭建新型平台和渠道,促进主体间的沟通与互动,进一步推动农民主体性的发展^[6]。

总体而言,学界对发挥农民主体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已达成共识,相关研究为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维度,缺乏对制度、文化与能力三者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分析,难以有效回应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民主体性培育的复杂性需求。基于此,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构建“制度-文化-能力”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现,并提出可行性的培育路径,旨在深化对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学理认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2 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现

2.1 制度维度:农民主体权利虚置

农民主体性是政治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关键变量,正视其困境具有现实必然性。从制度层面来看,农民主体性缺失呈现出多维交织的复杂格局。

首先,决策参与缺位。村民会议等民主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沦为程序性工具,一般仅在选举或重大事项时象征性召开,日常事务决策权集中于村“两委”,农民通常只能对既定方案行使被动表决权。此外,基层治理呈现行政吸纳自治的倾向,村级组织多关注于上级绩效目标而疲于征求民众意见,直接选择“替民做主”,将农民排除在决策系统之外^[7]。

其次,利益表达受阻。从横向维度看,分散的小农经营模式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乡村合作社和农民协会等组织多服务于政策落实,个体诉求难以凝聚为集体声音,削弱了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话语权。在纵向维度上,民意表达渠道行政层级明显,农民诉求难以传达至决策层。制度性权利与现实表达形成断裂,演化为“制度在场、主体缺席”的治理悖论。

最后,监督问责虚置。村务公开制度在现实中多流于形式,关键的决策依据与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农民知情权和监督权形同虚设。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拥有监督权,也常因缺乏制度保障与专业能力支撑难以有效行使。此外,监督机制存在外部难以穿透、内部缺乏制衡的双重困境,农民监督热情遭受打击,干群关系趋于疏离,进一步弱化了农民主体地位。

2.2 文化维度:农民主体意识离散

乡土文化是乡村价值观念、道德情感和情感归宿的文化载体^[8],更是主体性得以发挥的根本驱动力^[9],但目前乡土社会面临严重的文化异化乃至解构,导致农民主体意识离散。

一是乡土文化发展落寞。大量传统节庆、民俗技艺等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而逐步式微,农民与乡村的情感纽带断裂,加剧了与乡土的情感疏离。即使得以保存,也常因权力与资本裹挟而异化为脱离生活实践的“文化表演”,农民从文化主体沦为资本家谋求利益的“工具人”。此外,在功利化的价值导向下,农民更倾向于参与经济回报较高的文化活动,忽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是乡土文化建设滞后。尽管政府大力推动农家书屋、文化礼堂和村史馆等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但往往因内容与农民精神需求脱节而使用率低下。同时,部分村落为迎合市场逻辑,将传统宗祠、古井等承载集体记忆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旅游消费景观,割裂了文化与传统生活的深层联系,导致文化记忆失去了具象的载体,农民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逐渐丧失。

三是乡土文化生态嬗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与乡土规范日渐流失,个体化倾向显著增强,农民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不断被稀释,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凝聚与协同动能。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使农民在文化认同上陷入“自我否定”与“外部否定”的双重困境,集体性的“文化自卑”心理逐步显现,抑制了主体意识的内生成。

2.3 能力维度:农民主体能力欠缺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其主体性生成与发挥的重要瓶颈。当前,农民在认知和技术能力上普遍存在短板,难以适应现代乡村治理与生产方式的转型要求。

第一,认知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农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农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凭占比高达84.76%^[10]。这一数据表明,农村人口在教育水平上处于明显劣势,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政策的理解以及市场信息判断。尽管农民形式上拥有参与权,也常常因认知障碍难以实现实质性介入,加剧了农民在农村治理与经济生活中的被动处境。

第二,技术能力滞后加剧了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边缘化。数字信息时代,技术能力已成为影响农民主体性的关键指标。青壮年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使农村陷入“空心化”状态,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的留守群体普遍缺乏科学技术知识,技能水平低下。此外,尽管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已逐步完善,但由于操作难度大及培训体系滞后,农民产生畏难甚至排斥心理,导致“技术在场,农民退场”,主体性被边缘化。

3 农民主体性培育的协同路径

3.1 制度赋权：构建治理参与体系

制度的保障是主体性生成与实现的前提，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推动农民从“治理对象”向“治理主体”转变的关键。

首先，强化民主决策机制，提升农民参与权与决策权。通过完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机制，厘清村“两委”的职责界限，避免行政主导遮蔽农民意志表达。此外，利用数字化工具拓展决策参与渠道，弥补外出务工农民因“身体缺场”而产生的参与障碍，破解“脱域”农民参与难题^[2]。

其次，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表达权。通过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听证会等制度性安排，拓宽农民意见表达的正式渠道；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会等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增强农民在乡村事务中的协商能力与集体话语权。同时，简化行政流程，畅通民意传递渠道，确保农民合理诉求能有效传递至政策制定层面。

最后，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强化农民监督权。监督权不仅是农民主体地位的现实体现，更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要保障。应利用线下公告栏与线上数字化平台，实现村务信息实时公开，强化农民对公共事务全过程的知情权。此外，健全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推动农民依法进行民主监督，激活其行动能力与政治意识。

3.2 文化重塑：激活乡土认同机制

文化认同是农民行动的价值基础。面对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断裂，亟须以本土文化为依托，重建农民的乡土情感与身份认同，激活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因。

第一，深挖本土文化资源，重构乡村价值认同。乡土文化承载着农民对乡村的情感依赖与道德信仰，应充分挖掘地方民俗、非遗技艺等文化资源，举办民俗节庆、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实现传统文化“生活化”呈现。此外，借助短视频、自媒体等平台讲述乡村故事，展现乡村风貌，扩大村庄文化的社会辐射力^[11]。与此同时，应注重非遗传承体系转型，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从而激发农民的文化认同与参与欲望。

第二，完善文化设施建设，打造文化参与空间。结合农民文化需求，加快推动乡村礼堂、图书馆和文娱活动室的创新建设，使文化空间真正“活”起来。同时，探索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鼓励农民自主策划、组织与运营文化活动，让农民从活动参与者转变为文化生产

者。此外，在保留村庄原貌的基础上修复保护古建筑、历史文化遗址等人文景观，留住乡愁记忆与文化根基。

第三，唤醒传统文化组织，拓展社会参与网络。一方面，支持村民自发组织文艺队、剪纸坊等群众性文化团体，赋予其文化表达的正当性与制度支持，提升农民在文化创造中的获得感与价值感；另一方面，应推动文化产业下沉，鼓励“农民+文创”“非遗+产业”等模式，使农民在参与中重塑文化自信，成为文化再造与社会重构的能动主体。

3.3 能力提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能力提升是主体性实现的核心路径。面对现代农业与乡村治理的复杂要求，农民不仅要“愿意参与”，更需“能够参与”，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2]。

首先，优化乡村教育体系，提升综合素养。应持续加大乡村基础教育资源供给，推动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还应依托乡村夜校、农民讲堂和农民培训基地等平台，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此外，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模式，并组织开展外出观摩与实地调研等活动，实现认知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其次，构建信息支持体系，增强市场适应能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方面，应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时传达相关政策和产业动态等关键信息，减少因信息落差带来的决策风险。另一方面，激活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为农民提供市场分析、政策解读和技术指导等服务，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被动处境。

最后，推动数字技术普惠，缩小能力鸿沟。一方面，应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对智能设备、电商平台等工具的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设计便于理解和操作的数字应用程序^[13]，防止“技术孤岛”和“数据歧视”。此外，通过保留线下服务渠道及提供陪伴式指导等方式保障老年人、残障群体等特殊农民群体的权益，真正实现“技术在场、农民在位”的主体性目标。

4 结语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核心在于激发和培育农民主体性。当前，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仍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制度参与虚置、文化认同弱化与个体能力不足等，严重制约了乡村治理效能与农村社会活力的释放。为破解这一系统性难题，应构建制度-文化-能力的三维协同机制：依靠制度赋权重建主体地位，借助文化重塑激活价值认同，依托能力建设夯实发展基础。通过

这三重路径的有机联动,既可化解“政府热、农民冷”的实践悖论,又能实现农民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建设者”的身份跃迁。后续研究需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对主体性建构的双重效应,持续探索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融合创新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进文.带回农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转向[J].现代经济探讨,2021(7):123-132.
- [2] 舒绍福,肖志康.变革与重塑:数字赋能农民主体性[J].党政研究,2025,(02):36-43+125.
- [3] 李砚忠.乡村治理数字化中农民主体性研究[J].乡村论丛,2024,(05):35-43.
- [4] 毛安然.赋权与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5] 张剑宇.“文化功能聚合”:乡村振兴中激发农民主体性的文化理路[J].中国农村观察,2025,(02):103-125.
- [6] 贺子宸,王旭冉.媒介赋权与农民主体性再发现——以新型农民培育平台“云上智农”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3,(4).
- [7] 梁丽芝,赵智能.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样态、缘起与突破[J].中国行政管理,2022,(6).
- [8] 郑娜娜.激活乡愁: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传承与重塑[J].江苏社会科学,2024(1):146-155.
- [9] 皮永生,王艺雄,綦涛.文化—制度—行为:农民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研究[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6.
- [10] <https://www.zgtjnj.org/navipagen3025012913000156.html>
- [11] 金丽馥,郝嘉琪.和美乡村建设下农民主体性的建构路径探要——基于责权利关系视角[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0(05):60-73+124.
- [12] 刘芳,黄成利.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路径优化[J].农村·农业·农民,2024,(16):25-27.
- [13] 徐亚东,杨雨洁.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主体性地位:桎梏与对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05):46-57.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